读史札记

萧望之的软肋

□ 滴石水

中国历史上开创“孝宣中兴”的明君汉宣帝刘询,弥留之际,为托孤之臣辗转反侧。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即将继位的太子刘奭“柔仁好儒”,难以担起统领天下的万钧重担。太子太傅、一直教授太子的京师名儒萧望之,作为托孤之臣是理所应当的,但汉宣帝清楚萧望之的短处。犹豫再三后汉宣帝还是把萧望之选入了托孤班子。但后来的结果,验证汉宣帝的担心是正确的。

起初汉宣帝重视萧望之,并不是因为他的儒士名望,也不是因为他是萧何的七世孙,而是在处理霍光专权问题上突出的政治表现。霍光从汉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到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一直总理朝政,是汉朝实际上的统治者。霍光对大汉王朝有很大贡献,但长期柄权,党派亲族连成一体,盘根错节,占据朝廷,成了汉宣帝亲政的严重掣肘。幼遭巫蛊之祸、生长民间、饱受苦难的宣帝心中明白,自己初即位,仅凭自己的力量,无法改变这个局面。他保持最大的克制,寻找有利时机。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霍光死后的这年夏天,关中下起了大冰雹。萧望之因此上疏,要求汉宣帝安排面见,申说灾异之意。“学识渊博”的萧望之认为,这种灾害现象完全应验了儒家经典里“国之将乱,必有妖孽”的预言。他引经据典,最后说:“阴阳不和,是大臣专任,一姓擅势之所致也。”

看到萧望之敢于出来挑战霍光家族,汉宣帝非常高兴,一年之间擢升其三次,萧望之很快秩比两千石,一下跨进了大汉帝国的高官行列。借助萧望之的奏章,汉宣帝运用政治智慧,于公元前66年,成功用“谋反案”彻底团灭了霍家势力,真正掌握了大汉朝廷的实权,开始励精图治,踏上了“孝宣中兴”之途。

“以霸王道杂之”施政的汉宣帝,想使萧望之成为宰辅之才。“是时,选博士、谏大夫通政者补郡国守、相,以望之为平原太守。”他把萧望之放在了最高级别的地方行政长官位置上,炼用之意十分明显。然而,萧望之不明白汉宣帝的意图,认为他就应该在朝政中枢位置上,用儒家之道,影响宣帝,左右朝政。让其到地方当行政长官,显然是不重视他。于是,他上书宣帝,表达不满之意:“朝无争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悉出谏官以补郡吏,所谓忧其末而忘其本者也”,言外之意很清楚,把他派到地方去,尽管是平原太守,也是舍本逐末,大材小用。汉宣帝无奈,只好将其征入少府,管理皇室财务。

“宣帝察望之经明持重,论议有余,材任宰相,欲详试其政事,复以为左冯翊。”“论议有余”不行,汉宣帝还是想锻炼萧望之的宰辅之能,又一次任命萧望之为左冯翊。左冯翊是汉代拱卫首都长安的三辅之一,汉宣帝把他放在身边长安重要的行政区域任最高行政长官,就是想锻炼其实际才干。可萧望之根本领会不到这一点,居然公开称病不从。汉宣帝爱之心切,只好派身边的内侍找萧望之,告诉他皇帝的用意,萧望之这才勉强就任。

在任上萧望之究竟有没有按照宣帝的心意锻炼自己的实际才干,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只有简单几个字:“望之为左冯翊三年,京师称之。”可史书中详细记载的另一件事,倒能说明他是如何对待、处理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的。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西羌叛乱,朝廷派后将军赵充国率军讨伐。京兆尹张敞建议,夏季征伐,又在陇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供给保障,农业生产会受损失,加之没有积余,来年春季百姓必然缺粮。偏僻之地,更难买到粮食,希望朝廷让罪过较轻、且不是杀人盗窃的人,交纳谷物赎罪。并说从前先帝征讨四夷,百姓不增赋税,用过这些办法。萧望之竭力反对,认为百姓心思莫测,罪人必须进行教化,并用尧、桀之事,伯夷、公绰班之比,《诗经》之说,加以佐证,认为宁可让百姓饿死,也要守住道德底线。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看到朝争剧烈,加上汉朝廷有实力保障征战之供给,不纳张敞之议,平息了争议。

汉宣帝如此欲培养萧望之,因他十分清楚,治国安邦的能力不是从儒学经典上能得来的。要说学书本,汉元帝刘奭绝对过人,他有非常出色的学习天赋,不管多难的东西他都能很快学会,但汉宣帝观刘奭的性格和能力,曾断言:“乱我家者,太子也。”有一次刘奭建议汉宣帝少用刑罚,多用儒生,他大发雷霆:“从先祖开始,汉朝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那些儒生根本不会洞察世事变化,只会厚古薄今,国家怎么能交给这些人?”他希望刘奭的老师能教给自己儿子一些济世经国的真本领,也希望萧望之自己能有实际的宰辅之能。可是,汉宣帝的希望最终落空了。史家认为,汉朝衰败从元帝始。萧望之用心教授的是儒家经典,可实际的治国能力,汉元帝贫乏至极。最可笑的是他对萧望之最后的处置。

刘奭继位后,外戚和宦官的代表史高、弘恭、石显先后与萧望之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他们诬陷萧望之结党营私,谋害辅政大臣。汉元帝派人问之,萧望之说:“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本来根本没有的事,可萧望之这句话,等于变相告诉汉元帝自己在搞“党同伐异”。汉元帝念师生之情,不想把萧望之怎么样。“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时上初即位,不省‘谒者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名满京师的儒士教授的太子、堂堂治国之君,竟不清楚“请谒者召致廷尉”就是下大狱。刘奭后来知道真实情况后,诏令宽宥萧望之。谁知萧望之的儿子萧伋此时上书,为萧望之喊冤,史高等人立刻抓住时机,说萧望之不念圣恩,深怀不满,教唆儿子上书,把不是推于天子,倚仗自己是师傅,认为终究不会获罪。不堵塞他不服气的想法,那么圣朝就没有什么厚恩好施予了。汉元帝在弘恭、石显等人的劝说下,准予奏请。已经受过一次牢狱之辱的萧望之,哪能再受此辱,饮鸩自尽了。

唐代流行称润州为“吴门”

□ 乔长富

镇江的历史上,唐代除了流行称润州为“金陵”“丹阳”“南徐”之外,还曾流行称润州为“吴门”。说到此事,有人也许会不以为然地说:《辞源》说“吴门”是“古吴县”(今苏州市)的别称,《辞海》也说“吴门”是“旧时苏州的别名”,两书都举唐代张继的《阊门即事》诗为证。你凭什么说唐代流行称润州为“吴门”?笔者的回答是:事实胜于雄辩,唐代有关诗文显示:所谓“吴门”,就城门而言,它是指苏州阊门;就地区而言,唐代是流行称苏州为“吴中”,称润州为“吴门”。请看以下例证:

初唐崔融《吴中好风景》:“洛渚问吴潮,吴门想洛桥。”诗题“吴中”指苏州;“吴门”与“洛桥”对称,显然是指“阊门”,并不是指苏州。

盛唐刘长卿《吴中闻潼关失守……》称:“木落姑苏台,霜收洞庭橘。”从上句可见,诗题“吴中”指苏州。

盛唐独孤及在苏州所作《送长洲刘少府……》序称:“是月也,(刘少府)蚁船吴门,将泝江而西。”“蚁船”意为“浮船”,即乘船。唐代阊门是苏州运河边的水陆码头。所说“吴门”当是指阊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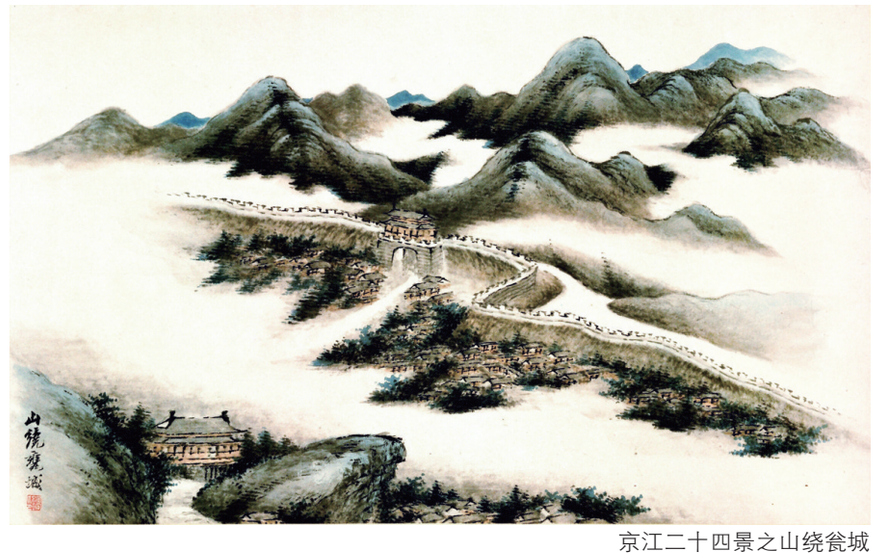
中唐权德舆寓居丹阳时所作《送陆校书赴秘省序》自称:“予业以贫病不能自振,方具台笠滋基,耕凿吴门。”“吴门”指丹阳所属的润州。

中唐张继《阊门即事》称:“试上吴门望城郭,清明几处有炊烟?”诗题显示,诗中“吴门”是指“阊门”,并非指苏州。

中唐李德裕在《平泉草木记》中自称:“余二十年间,三守吴门,一莅淮服。”这里是李德裕自称三次为润州刺史。“吴门”是指润州。

李德裕的友人刘禹锡在《和浙西李大夫……》诗中说:“吴门水驿接山阴,文字殷勤寄意深。”李德裕任润州刺史时曾作诗寄给任职“山阴”即越州刺史的元稹。可见诗中“吴门”是指润州。

晚唐五代诗人多称苏州为“吴中”。例如,皮日休《临顿为吴中偏胜之地……》《吴中言情……》《吴中书怀……》等诗诗题之“吴中”,陆龟蒙《奉和袭美吴中苦雨……》《奉和袭美吴中言情》等诗诗题之“吴中”,都是指苏州。



京江二十四景之山绕瓮城

与唐五代流行称阊门为“吴门”、苏州为“吴中”不同,唐五代很难找到称苏州为“吴门”的例证。即使如王维《送封太守》有“按节向吴门”,杜牧《送沈处士赴苏州》有“举酒属吴门,今朝为君起”之“吴门”,也还可以理解为所说是指阊门,以阊门指代苏州。这种情况,与明确称润州为“吴门”显然有区别。

综观唐五代及宋代诗文显示的“吴门”所指的含义及修辞手法,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以“吴门”指称阊门。这是用阊门为吴都城门的本义,在修辞手法方面是用典。另一种是以“吴门”指苏州,这是用“吴门”的引申意义,在修辞手法方面属于借代。第三种是以“吴门”比喻润州是吴地门户,在修辞手法方面是属于借喻。从词义的发展说,一般是先有本义,然后才有引申义。由此看来,《韩诗外传》说“颜回从孔子登日观,望吴门焉”,当是用“吴门”本义,是指阊门,而不是指古吴县。《辞源》《辞海》说此“阊门”指古吴县,值得商榷。

历史进入北宋。北宋开始不再流行称润州为吴门,而是流行称苏州为吴门。例如,南宋范成大《吴郡志》所录宋人诗文中,不少例子所说“吴门”都明显是指苏州。所举苏舜钦《答章传》“废官旅吴门”句,林希《叠嶂楼有怀吴门朱伯原》诗题等,都是以“吴门”指称苏州。同书卷十八说“世多称吴门为吴会”,更显然是以“吴门”指称苏州,“多称”表明,宋代是流行称苏州为“吴门”的。宋代以后更是如此。以致到了近代,人们多以“吴门”指苏州,甚至连《辞源》《辞海》等相当有影响的著述,也只知古代“吴门”是指苏州,却不知它曾经流行指润州。

推原唐代之所以流行称润州为“吴门”,当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是,历史上的润州,自从西周太伯自中原“奔吴”以及虞侯被封于“宜”之后,朱方、宜、谷阳、丹徒等就成为中原文化进入江南吴地的北大门。到了西晋末年,中原动乱,中原地区的大量移民进入丹徒一带,京口、丹徒以至南徐州更成为中原文化进入江南吴地的大门和集散地区,成为吴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融合的重要地区。南朝鲍照《从过旧宫》诗称南徐州为“东秦邦北门,非亲谁克居”,就显示了当时人认为南徐州是吴地的北大门。唐代刘禹锡《和浙西李大夫……》诗说:“风俗太伯馀,衣冠永嘉后。江长天作限,山固壤无朽。”更显示浙西及润州一带是中原文化进入吴地的大门,是吴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联系相融合的重要地区,也显示了唐朝人对润州之所以称为“吴门”的重要原因。

唐代流行称润州为“吴门”的现实原因,则是与安史之乱爆发后唐代社会现实有关。从唐人诗文的实际看,唐代流行称润州为“吴门”当始于安史之乱发生之后。当时,唐朝廷在“黄河流域土地大部被削去”,但“朝廷却仍能保持优势局面”,其原因,除了“广大民众要求恢复国家的统一,给朝廷以支持”之外,还由于“唐朝赋税收入,主要依靠江、淮地区,长江流域尤其重要。朝廷不论怎样处境困难,只要南北漕路畅通,就可以在关中立足”(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编第二章第一节)。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润州,既是东南地区的屏障,又是江淮漕路的枢纽,对于维护和巩固唐王朝的统治,具有重要意义。所以,盛唐后期储光羲在《临江亭五咏》中说“晋家南作帝,京镇此为关”。安史之乱发生后不久,李白在《永王东巡歌》中更称“丹阳北固是吴关”,就显示了后来称润州为吴门的含义。在这种情况下,润州逐渐成为浙西观察使和节度使治地,辖有苏、常、湖等州,负责管理和保卫东南地区,人们把本来指代阊门的“吴门”,扩展为指称润州,把润州比喻为守护东南地区的门户,从而突出了对润州在当时重要地位的肯定。至于北宋开始不再称润州为“吴门”,当是由于北宋王朝建立后,中原地区不再动乱不已,润州的地位发生重要变化。而苏州的地位有所提升,因而本来就因拥有阊门而被称为“吴门”的优势得以展现,理所当然地成为“吴门”头衔的拥有者,人们也就不再流行称润州为“吴门”,久而久之,到了明清以至近现代,人们甚至已“忘却”唐代流行称润州为“吴门”的这段历史。今天,甚至出现对“吴门”本义究竟是指“阊门”,还是指“古吴县”都有误解,更不要说对唐代许浑《吴门送客早发》诗题之类究竟是指苏州,还是指润州了。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对相关历史文化的正确传承,应当受到我们的重视。

语言学家吕叔湘的家国故事

□ 邹文学

吕叔湘(1904—1998),镇江丹阳人,我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1926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外国语文系,曾在丹阳中学、苏州中学等校任教。1936年公费留学英国,1938年回国。先后在云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在云南大学期间,他发表了第一篇有关汉语语法的文章,从此走上了语言研究之路。1952年起先后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曾任《中国语文》杂志主编、《现代汉语词典》主编、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

吕叔湘是近代汉语学科的拓荒者和奠基人,半个多世纪的语法研究,代表了中国语法学发展的主流。他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和修改,是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开创人,汉语语法学的奠基人。

文化救国定理想

吕叔湘生于普通商人家庭,从小目睹民生的贫弱和文化的凋敝,让年幼的吕叔湘产生了“文化救国”的理想。“五四运动”爆发时,他15岁,就读于常州省立第五中学。“五四”新思潮强烈冲击了少年吕叔湘的心灵。1936年赴英留学,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他心忧故土,提前回到祖国。为战事所迫,辗转到后方云南、四川的几所院校,从事语言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华西协和大学期间,他冒着日寇飞机轰炸的危险,在异常艰苦的生活环境中顽强做着学术研究。20世纪40年代,他与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叶圣陶一起开展语文普及工作,并正式加盟叶圣陶的开明书店,他们倡导以民众为本、以民族文化振兴为己任的“开明精神”,在中国文化界兴起了“开明之风”,对推动当时社会文化教育和科学进步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影响了中国几代学人。

胸怀家国担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吕叔湘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后转入中科院语言所任研究员。新旧社会的对比,使他对共产党的信任进一步加深。他自觉把个人命运同党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语言教研的学术组织和社会公益中。作为知识界的杰出代表,他积极参政议政,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建言献策。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1953年底开始起草,吕叔湘从1954年3月起就作为语文专家参与其中,倾注了对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极大热情。1982年2月,宪法迎来最重要的一次修订,吕叔湘又全程参与了宪法的文字推敲和民事诉讼法等其他法律的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和建议。

现代汉语奠基人

现代汉语的创立和定型,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吕叔湘正是这一事业中最重要的一位实践者。他是我国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开创人,汉语语法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推进语言规范化和普及语文教育的实践家。新中国成立后,吕叔湘满腔热情地投入新型教材编写和新型字典编纂工作中。1951年,吕叔湘邀请朱德熙合写成的《语法修辞讲话》,从6月6日起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当天,《人民日报》在头版郑重发表了由毛泽东亲笔修改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这部《语法修辞讲话》有力地推动了语文知识的普及,在新中国文风建设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我国最高语言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吕叔湘全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部门所有重大的语文建设工作:确定现代汉语规范任务、拟定中学教学语法系统、研制汉语拼音方案等。1958年,吕叔湘开始主持《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工作。《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经过100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完成了编写工作,开创了我国辞书编辑出版的新时代,为我国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和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他还立足语言学专业知识,尽心竭力地为中小学语文教育、社会语言应用、国家语文政策的制定和推广倾注心血。

一代宗师树风范

吕叔湘贯通古今,融会中西,严谨细腻,独创新见,始终为学界所推崇,成为语法学界有口皆碑的学术领袖。他的著作在汉语语法体系建设及理论和方法上都有开创意义,成为半个多世纪来我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成果。吕叔湘出版的专著和编译作品有20余种,包括《中国文法要略》《语法修辞讲话》《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现代汉语八百词》《近代汉语指代词》等,发表论文和其他著作计600余篇,涉及语言研究、语言教学、词典编纂、文字改革、推进语言规范化和普及语文教育等多个方面。他对家乡丹阳的方言也有很深的研究,写有《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等多篇重要论著。

吕叔湘是中国语言学的一代宗师,又是学者中的道德典范,学风人品令人景仰。他生活俭朴,热心公益事业。1983年,为推进祖国语言研究的发展,鼓励对中国语言文字研究领域有成绩的中国青年学者,他捐献出多年积蓄,设立中国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几年后,他又把荣获首届吴玉章奖特等奖的奖金全部转入青年语言学家奖金。如今,这个重要奖项已更名为“吕叔湘语言学奖”,多年来,奖励和培养了一大批语言学领军人物和学术骨干。

吕叔湘雕像

吕叔湘情系家乡,不忘故土。“文化大革命”前,他捐款万元,资助丹阳县中学建造图书馆。1987年10月,他偕夫人回家乡参加丹阳县中学建校70周年庆典活动,再次捐款2万元,设立“吕叔湘奖学金”。他还亲临母校—丹阳市实验小学建校70周年庆典,并捐款1万元设立“吕叔湘奖学金”。吕叔湘的家国情怀、大师风范和奋斗精神,激励着家乡人民。吕叔湘先生逝世后,丹阳市政府于2003年9月将他曾工作过的丹阳市高级中学更名为“吕叔湘中学”,以示纪念。

中国银行 镇江分行 BANK OF CHINA ZHENJIANG BRANCH
“中行”杯 讲史志故事 品镇江风骨 征文